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古清美君民國六十三年畢業於本校中國文學研究所，其論文由何佑森教授指導。古君現就讀於該所攻讀博士學位。

On the Life and Academic
Thoughts of
Huang Lee Chou
Gu Ching Mei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No. 49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1978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四十九：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主編者：王龍

曾宇

著作者：古清

美才純

版權所不
印准翻有

印行者：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天貿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十五號

緣 起

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及歷史學兩研究所，歷屆研究生畢業論文，不乏足供學人參考之作；惟因本校經費不足，未能為之發表；承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始得慎選各論文，分冊繼續印行，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特此誌謝。

緒論

中國學術史演變到明末，起了一番極劇烈的變化。在程朱理學籠罩下曾是一股清泉活水的陽明學，在不到兩百年之間，因其主張心性採取自由活潑，直接平易的把握方式，而開啓了這些特點同時隱含的危機。王學一傳再傳，普遍流行之後，本來指良知本體而言的「無善無惡」、「圓滿現成」、「不假修證」，被引用成行為上一切放任，目法聖賢法紀之口實；同時，高談玄論者又毫不隱諱的將禪學末流之論與陽明學論良知心體的部份相附會而大行其道；這儒釋兩家學說末流的混淆，致使原本儒家精神越失越遠，而士人束書不觀，空談心性的惡習也使整個學術界陷於腐敗、癱瘓的情況。

此時在政治上也是最黑暗的時期，君不問事，奄宦當權，正直之士遭排擠迫害，國事日益敗壞。此時有東林之起，由政治而爲學術，圖講學以干朝政，欲同時挽二者之頽勢，故其論學本質上即有「致用」之意味在。

本文所探討的人物——黃梨洲，正是生在此種學術與政治皆末微的時代，他的父親及師長皆是東林之士，故他很自然的受了這種啟發。其早年留意的學問範圍很廣，但由於其家學所傳，及自身興趣所在是史學，啓示了他治學目的必落實在「經世致用」上的基本態度。他的思想是純儒家

的，尤其在當時儒釋不分的學術風氣中，他更要堅持這一點。他年輕時一面從蕺山治心學，一面勤研經史學。梨洲繼述蕺山學，可說是爲了蕺山學能救正當時心學流弊並出自闡佛的立場。中年後梨洲復興證人書院，思以蕺山「慎獨」之說挽救當時倡道亂行的心學風氣。後修撰明儒學案，更以此種思想爲主而將有明一代學術加以批評及補正；書中處處寄寓了爲學術界振衰起蔽的心意。他同時感覺到宋明幾百年來重論「本體」，而將心性學導入精微玄奧之一面的學術風氣，已使士人極其厭倦而達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至此，不若將心學還之於單純樸實的踐行，而將學術重點放在真正賦有經世精神的經史實學。故他教授弟子，兼提倡經史學，以儒家六經作爲學術根底，必不致失儒家精神而入釋，更以「史」通變達用於當時顛沛危亡的社稷，方免於空疏。

梨洲之治史，不僅爲當時南明史留下許多詳盡資料，明夷待訪錄一書更爲其治明史的成績。他分析明代政治的種種問題，以自己的見解指出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所在乃是由於思想，觀念的謬誤。他即以一己之政治創見爲經緯，將明代一切政治制度問題組織起來而加以詮釋，並從而提出一套治平之方案，期爲後世明王所用而利於天下。

總之，梨洲學術是先站在一「史」的觀點，整理並檢討明代整個文化系統，而以自己凝鍊出來的思想去處理問題而下一判斷。故其學術史、政治史中處處見出他所寄寓的義理，本文所研究的梨洲學術思想，多由此及其文集中洞見。

梨洲學術影響所及多於浙東一帶，使其地史學爲之一盛，且使浙東史學有一種特賦思想、義理，並期以經世爲目的的特殊風格。同時，梨洲在經史學方面的提倡，和清初另一大家——顧亭林之學風相應合，對明代腐靡的學術風氣轉變而步上清代樸學均有極大貢獻。

梨洲之學術範圍甚爲廣大，本文並不能詳論其每一方面的成就及其細節，故重點在於探究明代理學與清代經史學這兩種看來截然不同的學術潮流，如何在梨洲一人思想中可以溝通；以思想而言，梨洲至晚年都未全然脫離心學矩矱，他如何能不背心學而又同時倡經史，以開清代學術先鋒？故本文即在於分析其一生豐碩的學術成績所本的思想及其態度究是如何，方致使梨洲以一人之力而治各門範圍各異，精神也不盡相同的學問而能不相抵觸，兼容並蓄。本文敘述其一生思想的最主要部份，即是以他對陽明學之述評及蕺山學的取捨以貫串之，以見他如何由這兩人思想的孕育中醞釀出他自己的思想，以其一身而作爲由心學跨入經史學的橋樑。梨洲晚年所講的心學已然不同於傳統心學，而其所治的經史學亦不同於後來乾嘉講經史學特重考據的風格；因梨洲位於兩者轉換之處，加上特殊的時代環境所影響，故造成其學的獨特精神，故其所蘊含的學術思想及其前後異同轉變，實有值得我們研究之處。

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目 錄

緒論

第一章 黃梨洲之生平

一

第二章 梨洲之思想背景

二

第一節 朱子格物致知的問題與梨洲之批評

三

第二節 陽明學的重心——致良知

二五

第三節 王門各派的岐異及流衍

二九

一、現成良知

二九

二、守靜歸寂

三三

三、泰州派之安身義及其影響

三八

第四節 東林與梨洲

四四

一、顧憲成、高攀龍對「性善」義的闡發及「無善無惡」的辨正

四四

二、劉蕺山的學說

五〇

第三章 黃梨洲的思想

六九

第一節 梨洲對陽明的述評

六九

一、陽明學的價值

六九

二、對陽明學的修正

七三

甲、致良知

七三

乙、四句教

七五

三、梨洲與陽明

八二

第二節 梨洲對蕺山學的取捨

八四

一、早期及中年期

八四

甲、意說的發揮和江右王門的關係

八五

乙、理氣說的闡揚及其性善論

九二

丙、與友人的論辯

九七

二、晚年之思想

一〇九

甲、萬公擇墓誌銘之意義

一〇〇

乙、明儒學案二序之意義.....	一一一
第四章 黃梨洲的學術思想與浙東學風.....	一一二
第一節 梨洲經史學中經世致用思想的發揮.....	一一三
一、明經.....	一一七
二、治史.....	一一八
甲、明義理.....	一一九
乙、經世.....	一二〇
第二節 梨洲之學的流傳.....	一二一
一、萬季野與梨洲之學.....	一二二
二、全謝山與梨洲之學.....	一二三
三、章實齋論浙東學術.....	一二四
結論.....	一二五
附錄：主要參考書目.....	一二六

第一章 黃梨洲之生平

黃宗義，字太沖，號南雷；浙江餘姚黃竹浦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一〇），卒年清康熙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五），年八十六。後人稱爲梨洲先生。

父尊素，東林名士；天啓二年，官山東道監察御使，性忠勁耿直。時朝中黨論方興，熹宗昏庸，政柄移之魏忠賢，小人趨炎附勢，奄勢愈大。當時朝臣楊漣、左光斗等與尊素爲同志，常夜過黃邸，議論朝政，屏左右，唯太沖侍側，得以盡知朝中清濁忠奸之別。時年方十五歲（註一）。魏奄權勢如日中天，尊素不畏權暴，上書三劾，魏深恨之，逐削籍。尊素素有智謀，奄黨皆欲去之爲快。時吳中傳言尊素欲效前朝楊一清誅劉瑾之例，授計當時太監李實，帝前密告魏忠賢，以爲誅魏之法（註二）。此說恰中魏奄深懼之處；於是繼汪文言獄後，由李實誣劾納贓之罪，將尊素連同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周起元悉逮下獄。時逮捕尊素及周順昌之使者來至蘇州城中，引起吳人公憤，打死旗尉並沉其駕帖（註三）。但兩人仍自就詔獄。太沖送父至郡城，劉宗周前來踐別，尊素命太沖從之遊（註四）。不久，尊素及諸大臣被奄黨許顯純等酷刑拷打，悉死獄中，忠節慘烈。以宗周爲師，竟是其父最後之遺命。父既亡，他母親是個深明大義的婦女，雖哀慟逾恒，唯令其子切莫忘殺父之仇。忠直而屈死之父冤與痛切母教，刻骨銘心；於忠於孝，都不容

他有一絲苟且，是非忠奸涇渭分明，忠君愛國即是己任。

崇禎元年，袖長錐及草疏入京頌冤，圖報父仇。時魏忠賢甫誅，太沖疏告李實、曹欽程；刑部訊許顯純、崔應元，太沖於會訊時出錐錐許顯純，指控諸人與魏狼狽爲奸，陷盡忠良，二人卒論斬。太沖授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並與宗建子周延祚捶死獄卒（註五）。後來這一群父兄被奄難的子弟共設祭詔獄門中（註六）。這時太沖方十九歲。

自此之後至崇禎十七年明亡以前，是太沖多方遊訪並孕育其學之時期。當時越中自陽明後一傳而爲龍溪，再傳而爲周汝登等張明「心體無善無惡」之說，陶望齡、陶奭齡，更雜於禪學；奭齡講學甚而流入因果輪廻之說；劉宗周憂王學之將壞，在證人講會上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與之相抗（註七）。太沖於此時正式開始隨侍而學。他維護師說，不遺餘力，曾聯合當時有名的一批人，力闡釋氏；可是多半的人並非真懂佛學，只是一味隨俗起鬨謾罵，並未起多大作用（註八）。又有釋家子弟圓澄、圓悟亦欲竄入宗周學說，他也採用同樣的方法，毫不假借，加以斥逐（註九）。在心性之學的見解上，他尙沒有足夠的體驗和見地，對劉蕺山之學亦未必有深刻的解悟；但站在一個立志作爲純儒者傳統的立場，對於王學末流的入釋，他確乎是抱著毫不留餘地的排斥態度。

他同時又以文會友，學詩法於番禺韓孟郁，入詩社，友詞人（註十）。二十一歲，曾參加考試

，不第。曾爲相的文震孟見其卷，「嗟賞久之，謂後日當以古文鳴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註十一）。

落第後，想起父親被逮時，曾吩咐「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將架上獻徵錄涉略可也」（註十二），正以閉門讀書；兩年工夫，閱畢家中所藏明十三朝實錄、二十一史浩瀚之數，爲其一生精湛的史學成就之本。

在這段時間內，他也納交了幾位切磋學問性命，終身不易之摯友，如萬履安、陸文虎和沈眉生；這幾位朋友皆是學問精篤，胸懷洞達，奇節偉志，在當時是非賢奸難辨的亂世中皆可稱嶽嶮磊落，高潔絕俗（註十三）。太沖自云：

「余束髮出游，吳來子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要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概……。」（註十四）。

由此看出，善友的提挈磋磨，對太沖之學業和志節兩者的激勵及啓導之力，必非輕微。

時張秀初創立讀書社於武林，網羅了許多青年才俊，如江道闡、嚴子岸、鄭玄子等，並及於浙東陸文虎、萬履安等，盛況一時。他也一度參加；在同讀十三經注疏之時，就注意當時人並不

重視的名物象數方面；太沖與秀初頗為相契，共同研究了地理志和律呂方面的知識（註十五）。他曾對於這種讀書風氣評曰：

「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之士，如張秀初、張道闡、鄭玄子、虞仲鴻，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過訓故，熟爛口角；聖賢經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爲何物。」（註十六）。

他已經省覺到，讀書若不省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縱使博覽經史並精研訓詁，並不能致用於當世；以他從經史典籍中摭取的精義，參諸於世事，使他體會到此時代中如何致用救國當是首要之務。「以學術經世」的思想已漸在他年輕的心中萌芽、生長。

太沖對文獻書籍的重視，使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凡聞某家有藏書，便前往觀之，甚至想盡抄所有。他前後曾所知見及尋訪過的藏書處計有：南中千頃堂、甬上天一閣、錢牧齋絳雲閣、武林程雪樓、祁氏曠園、歙溪鄭氏叢桂堂、越中鈕石溪世學樓等（註十七），及崑山徐健菴之傳是樓（註十八）。太沖一生所收集的大批書籍，垂老遭水患，加上身後一火，失去大半，鄭南溪爲之整理復完，尙得三萬卷。全祖望論曰：「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以玩物喪志，是則

藏書之至教也（註十九）。全氏可算是相當認識太沖讀書和藏書的態度。

太沖在讀書學習之中，並未忘記國事，當時魏奄舊黨阮大鋮，在忠賢事敗之後遁跡南京，藉著自己度曲和聲的才華，混於歌台舞榭，欲圖納交當時負名望之流，以冀用於復起之日。太沖和受過奄黨所害的子弟們，深知其用心不測，以清議自持，便上了一篇「留都防亂揭」，與陳貞慧、吳應箕、周仲馭聯名，以東林顧憲成之孫果爲首。揭發之後，果令大鋮閉門不復敢出，但是阮大鋮之禍並沒有斷根，他交好當時下野宰相周延儒，延儒的再度入相是由復社張溥所邀，東林黨心知周延儒必非善類，但當時朝臣互相傾軋，冀由延儒之出引進東林人士參政；延儒既出，果然不脫奄黨關係，先不敢明目張胆的用阮大鋮，卻依了他的話起引進其同黨馬士英（註二〇）。

流寇到了北京，京師失守，思宗自縊。馬士英扶立昏庸的福王，定策有功，阮大鋮跟著被重用，外放史可法至揚州，在馬阮的把持下，南明弘光注定了必亡的命運。阮大鋮一得勢，先報私仇，將防亂揭中列名者造成「蝗蝻錄」，一網打盡，周仲馭下獄死，太沖九死一生，逃回浙東。時清兵已至，方免此禍（註二十一）。

次年越城降，宗周絕食自盡；「先生勺水不盡者已二十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兩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壠，余逐翻嶺門山支徑入楊壠，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領之而已，時大兵將度，人心惶惑，余亦不能